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〇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六七期 ——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1f)

【各抒己见】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陈益南
【人物追踪】采访蒯大富	田炳信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五）	刘文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各抒己见】

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 陈益南 •

(一)

中国文坛大佬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自1986年至今，已近二十年。但是，此议却始终未能获行，“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仍只能是巴金老人及许多文化人的一个梦。前不久，因巴金的辞世，又使人们自然而然地重掀这个话题：为什么仍不能满足巴金的这个遗愿，而建一个文革博物馆？

但是，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可以知道，此事依然没有希望，尽管巴金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大文豪。

对此，很多人都不解：既然要否定文革，为何连建一个以批判文革为宗旨的博物馆都办不成呢？

对此，近二十年中，人们一直都是深感困惑，继而失望，甚至愤慨。

凡事都会有个原因。那么，这个谜的“底”，又是什么呢？
其实，原因并不神秘，只是有些复杂。复杂之处就在于文革历史的“博”！

这种“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涉及面之广，二是牵扯度之深。

巴金为代表的文化人，对文革的批判讨伐，或者说对文革的否定，其内容，自然是控诉文革中的极左专制对文化的破坏，及其对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的迫害打击，并重在追思那些在文革中无辜受害的人们。这一目的与举措，在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来，巴金为代表文化人在种种传媒报刊书籍中，所发表的有关文革的作品，都已清清楚楚的表明了。同时，他们欲将那段历史永远批判性地公示之建议，也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问题是，巴金们的文革经历，虽然是文革历史的重要一页，然而，却并不是文革历史的唯一内容，甚至，也不是文革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只是那段曾震惊了世界的历史之画页的一角。

然而，文革历史所涉及到的人事之广，所牵扯到的问题之深，却远不是什么“动乱、浩劫、悲剧”之类定义可以概括得了的。如欲重翻那一页那一幕，因其所涉及到的人事之广，便难以避开大面积的是非之争；若再详尽回放那些往事的篇章，其所牵扯到的问题之深，更将会使大批今日尚居正史高位的人物，也坠落到历史的被告席上。

因此，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猜测：在文革影响尚未彻底、完全、永久性的真正成为仅仅只是历史之前，在文革的历史丝毫不会牵涉与撼动官史中那些人物及其光辉之前，巴金的倡议，就仍只能是处于梦中。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二）

文革中发生了很多“史无前例”及已早有前例的事情，之中的某些阶段、某些社会群体的命运与某些事件，其波及面之广、震撼度之烈，是远远超过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们）所遭到的不幸与苦难，其所留给历史的记忆。

例如，文革中，发生过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从刘少奇、邓小平起，直到共和国的一些部长、省级党委与省政府的首脑等），曾被当时的中央下令，予以抓捕监护、囚禁审查数年（被关押最长时间有的达10年）。同时，另一方面，更有几乎全部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们（文革中，其客观中性名词称为“当权派”，而贬称则为“走资派”），也受到了成千成万风起云涌、以建立了各种组织之“造反派”身份的群众与基层小干部们的冲击、批判、斗争，乃至部份还被在短时期内“打倒”罢官。

又例如，也曾有过数以百万计的、在文革中先后成为了“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基层干部（也包括有教师与文艺界人士）、农民，在文革初期、中期与文革结束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数次被各级“当权派”一上来就动用国家机器，将其打成“新右派”、“反革命分子”，或关押批斗，或直接判刑入狱的一幕幕绝非虚构的历史。

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学生，在文革进行了二年多时，突然间，却由受宠的“革命小将”之高位，降至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境地，一古脑都奉命“上山下乡”落户农村做起了新农民，并换上了新的称呼：“下乡知识青年”，红卫兵的历史从此由知识青年们来续写。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红卫兵与知青们，不论是以“不堪回首”、或以“苦乐相间”，还是仍怀“青

春无悔”的心态；不论他们是以忏悔或懊悔为多，还是以怀念为重，来描述“老三届”们丰富却不乏艰辛苦楚的历程，至少，人数众多的他们，在文革历史中所处的画面之大，不会在巴金们之下。

而最不能抹煞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各地都曾先后产生了许许多多如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知名及尚不知名而可傲立史册的志士仁人、民族楷模，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公开向世人控诉与揭露了极权的专制主义之罪恶。从而，他们的命运，便成为了文革历史中那永远闪耀着星光的亮点。

这众多的重要历史内容，在巴金老先生设想的、得到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们）支持赞同的“文革博物馆”建议中，有没有也包含其内、以至浓墨重彩的回放计划呢？

很遗憾，从近二十年来公开发表的种种关于文革博物馆建议的论说中看，似乎那“馆”中并不陈列这些事关亿万人活动的历史重大情节，而拟入“馆”的，大约都只是文革中红卫兵斗老师、“破四旧”、烧书画、毁庙宇，以及文化人们所遭种种迫害的故事；而且，拟陈列于“馆”中的，大约只有文革的部分受害人之灵位。总之，基本上只是“伤痕文学”蓝本的放大化与具像化。而对于红卫兵，更是没有作过任何组织构成的区分，而是将不同时段出现、性质截然不同的红卫兵混为一谈，而全然不顾文革中确有打老师的保守派红卫兵与批判“走资派”的造反派红卫兵之重大差别的历史事实。

现在国外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受中国文化人对文革描述的影响，很多人就是以巴金们的“文革博物馆”内容为蓝图，这样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革历史。例如，前不久境外制作、放演的那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影片，就全是这一类有限历史断面画页的回放与反思。在这类介绍与研究中，文革的历史差不多就只剩下了红卫兵的疯狂，只剩下了当时七亿中国人的全体愚昧之形象。

然而，这样的“文革博物馆”，其意义有多大呢？

实际上，文革不只是有悲剧，尤不只是部分人的伤痕，而是有着更广博的内涵。之中，也包括了那确曾有过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们对官僚主义者所发出的愤怒故事，以及同样确曾有过的理想主义者争取民权的抗争、追求民主的努力。

而且，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只有“右派分子”们单方面被动无辜挨整的悲剧；而文革中，整人者方面与被整者群体之间，却曾发生过数次很大规模的博弈与位移；之中，不同的人，虽都做过被批斗的挨整对象，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其性质有时却会截然相反。

何谓“博物馆”？其核心，恐怕是不能少了那个“博”吧？！

若仅以局部的遭遇，就冠以全部的名义，这事，想来不予大张旗鼓权威性的正式建立，可能还好些，以免误导后人。

正如，以前我们的教科书，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描绘成只有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那类小打小闹的故事一样，结果，致使整整有二代人谈起抗战，便只有蒋介石躲到峨嵋山的概念，只有平型关大捷的传奇，只知道狼牙山五壮士，只知道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而全然不知晓还发生过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昆仑关的血战、武汉、长沙的大会战、以及进入缅甸抗日的远征军等等数百万中国军队在主战场上热血抗日的重大历史，全然不知晓还有英勇抗战的张自忠、戴安澜、王铭章等数百名为国捐躯的中国将领之大名。

巴金等文化人经历，固属文革历史的一部分，但，却还不是文革历史的主页。就象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虽然也是描写了1957年右派的真实故事，但是，她展示的那些历史，却几乎有着特例的局限。因为，她笔下的章伯钧，在成了“大右派”后，竟然还可以有小车、秘书、专门厨师、带庭院的宽敞住房，还能仍处贵族生活之中。而实际上，当年那其他的55万“右派分子”们过的日子，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绝大多数人在那些年的岁月，基本是由被强制劳改、劳教、人身管制等毫无半点人权，以及生活上极度艰辛而生不如死的内容所构成。如果，人们夸大《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价值，将章诒和所叙述的局限历史画面（虽然也是真实的个案），竟当作1957年“右派分子”们基本状况的蓝本，那又怎么能真实地反映出那段历史的本质？！

由于种种具有的特点与优势，近三十年来，巴金等文化人尚可凭借有限的话语权，凭借他们掌握的媒体，运用文学艺术的武器，对他们自己的文革苦难经历，予以不断的展示，对四人帮及极权专制主义罪恶不断的进行挞伐批判，这原本也属题中应有之事。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文革的反思，仅仅只有文化人的演出，也仅仅只停留在文化人的某些局部范围及局限时段内的故事（也并非文化人在文革中全部过程的故事），或者仅仅只局限于极少部分文革初期受害者的悲剧，而没有其他包括上述那一大批重要历史的演员们站出来认真说话，那么，这样所描述的文革，对后人所造成的印象，便会产生出以偏概全的种种误导。

现在，三十九岁以下的青年人，不是在文革后才出生的，就是在文革中尚是懂事的幼童。他们对文革的了解，基本只能来自于文化人所写文章的书籍报刊、来自于有选择性提供的极有限也很抽象的教育文本，特别是来自于文化人那些艺术性的叙说作品。由此，文革，对于在三十九岁以下年轻人的头脑中，便只有红卫兵“造反”、烧书毁庙、打老师、挥动语录跳忠字舞的画面，或只有文化人在文革中饱受迫害、文化在文革中被完全毁弃蔑视的状况，再多一点，就只有老干部都无缘无故被批判被斗争的不可理喻之场景。由这一切，便导致了我们可以见到的则是，有些年轻人一说到文革历史，便会用不容置疑的极端口气指责文革，评其是“如同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说红卫兵就是“纳粹冲锋队”，一开口，便定义文革是“人类历史中最黑暗的岁月”，是“等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嘲笑“那时的（七亿）人都发疯了”，而不分清红皂白将参加“造反”的人们，作为坏蛋的代名词，均列入另册，等等。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虽然对文革的评价各有不同，但是，相信有一点很多人却都明白：很多事，尤其文革的真正全貌，远不是这些年轻人所理解的那种情况，文革写下的历史，也远不止在文化圈等小小范围内！

青年人由于能接触到的历史真貌太少，只能接受到不全面的文革史教育，只能解读文化人纯粹的“伤痕文学”，因此，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以有限资料去判断一段复杂历史的常识性失误。对此，只能说是遗憾。然而，由此可见，在整个被有意尘封的文革历史真貌可以全部公开之前，建一个巴金所倡议而内容局限的“文革博物馆”，又会有什么益处！

（三）

即便是这样一个内容大大局限的“文革博物馆”，巴金老先生的倡议已走过了近二十年，但也没能获准变为现实，这又是何故？

因为，这之中有一个牵扯度之深的问题。

文革的过程，的确不是现在的青年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直接、那么黑白分明、是非清楚、

阵线整齐，而恰恰相反，是极其复杂曲折、对错交叉、是非混合，谬误与真理相杂，忠诚和阴谋同行。

例如，文革问题的历史责任，固然是要由毛泽东与“四人帮”们承负。但是，实际上，参入“运动”了那文革的，却远不止他们。

否则，为何会发生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便套用1957年的模式，将大批文化名人与普通干部和群众打为“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的事？！为何运动一开始，就会发生外交部长陈毅一棍子便将外交部三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这类事？！为何会有王震部长被管农林的谭副总理欲打成“反党分子”、而王部长本人却又在文革中直面斗争彭德怀的大会上“愤怒揭发批判”彭老总、诬指彭总是杀害井冈山革命领袖袁文才、王佐的“凶手”之闹剧？！而原本依靠造反派支持、毛泽东赏识才得以在文革中崛起的华国锋，为何后来却又会发生他主持逮捕四人帮、并还将所有造反派扣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帮派分子”罪名而一棍子整死的似悖情理、似不合逻辑之怪事？等等。

而这些，却都不是可以用什么路线斗争、权力之争，以及什么“动乱、浩劫”的定义，所能解释得通的。

更有太多的事，需要对其作出圆满清楚的解读，但至今不能有明确的真正说法。

例如，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党政官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以造反派为代表的社会底层群众的冲击、批判、斗争。这些事，虽然现在人们都比较了解；挨批挨斗者在文革后，也大都作了无数次扬眉吐气的控诉，并记载在档。但是，对这类事情起始的来龙去脉，即为什么会发生冲击批判斗争领导干部们这样的事之原因（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民群众会对理论上是自己的“服务员”、“公仆”们，有着如火山爆发般的怒气与不满？），文革后至今，却始终无人予以说明，而只是含糊带过，或笼统归结于毛泽东的错误号召、四人帮的阴谋。

然而，当时参加造反运动的群众，不说上亿，也有几千万人，而这几千万人汇成的潮流竟然都会集中愤怒地指向地方党政官员们，这就绝不仅仅是凭毛泽东的号召、或是什么人的阴谋能办得到的了。如果，上面的号召，并不合民意，即便是天天发指示，称是几个“代表”，其效果也会甚微的。至于，是不是当时那几千万的人都“发疯”了，对此，稍稍了解一点历史真相的人，相信都能有自己的理智判断。

又如，文革中的1967年8月，在湖南省道县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人间惨剧，在二个多月共66天的时间里，有4519名无辜的农民（1949年前才是地主富农，而那以后十多年来已变成了从事农业劳动、却地位最低下的人们，及其子女等），竟然被活活打死、砍死、淹死！这种暴行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得到过什么人的指使与支持？而又是什么动机，导致了凶手们如此残忍？

对此，若要建“文革博物馆”，就应能具体解答，而不要胡说什么“凶手是造反派”，将莫须有的罪名随便扣在已被剥夺了辩护权的历史群体身上，因为，那是绝对的谎言！也不要含糊糊糊，说什么“文革悲剧”、“极左罪孽”之类空洞无物而轻飘飘的大话；不说讨债，至少也应明确的将那欠下血债的事主及指使者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那4519条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灵魂，至今尚未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巴金设想的“文革博物馆”，其实已有过一些微型版本。例如，辽宁沈阳的某个公园中，若

千年前，一家杂志社内那些有正义感的热心人，就为张志新立了一座纪念雕像，以让人们可以追思怀念这位在文革中集悲剧与抗争为一身的英灵。然而，这些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前去悼念的人却并不多，尤其是更难有年轻人前往吊唁。为什么？并非是今人的冷漠，而实是那纪念雕像的碑文，未能具体展示出张志新无辜受难及被惨遭割喉的悲情，未能展示出究竟是什么人下了如此毒手、以及为何会下如此毒手！

因此，仅仅一些空空洞洞、大而无物的纪念文字，却又如何能指望后来的人们，会为这雕像而震惊、而流泪、而钦敬、而反思呢？

还有，即便在文化人的文革苦难记录中，也仍存在许多的空白，许多的疑问。

例如，众所周知，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在文革初的1966年8月24日就被逼得投河自尽。问题是，在当时8月24日之前的日子里，除了发生过一帮红卫兵小姑娘（中学生）在孔庙气势汹汹的批斗与用带铜头的皮带毒打他及其他28个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的暴行之外，老舍先生在其单位（北京文联）中，又受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待遇”呢？当时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遭到如此的摧残，为什么没有人来保护？为什么当时在批斗现场明明已有一位副市长在场，而却不出面制止那些暴行？为什么会有同为作家的某人，竟然会向在场的红卫兵“揭发”：“他（老舍）是拿美金的！”，以致使暴行升级？为什么老舍死后火化时，北京市文联公然会给老舍家人开具那张毫无人性的介绍信，那介绍信上竟写着：“我会舒予（老舍本名——本文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那些事前事后指使人们在大会小会上不断高喊批判老舍先生的人，用比红卫兵小姑娘要凶狠数倍的气势而指控老舍先生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都具有怎样的身份与动机呢？这一切又给老舍先生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氛围？！

现在，只要翻阅一下1966年5月至8月底各地的所有“机关报”，你就能从上面到处都是连篇累牍的点名批判文化与教育界名人的大块文章，体会到文革那个阶段的气氛与性质。那些被批判的人们，所获的罪名都差不多，均离不了那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只是被批者的名字不同，北京是“三家村”，上海是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江苏是匡亚明，浙江是刘丹、林淡秋，湖南是康濯、林增平，四川是马识途，广东是秦牧、欧阳山，等等。相同的是，批判者都是各省党委的“机关报”，而并不是红卫兵，更不是什么尚未产生出世的造反派。

巴金老先生设想要建的“文革博物馆”中，无疑会有悼念老舍先生的一席。但是，之中，会不会同时也将展示那些把老舍先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主持人与帮凶、并将他们的行为钉上耻辱柱、而不仅仅是指责那些红卫兵们呢？

至今，似乎也都还没能看到这个状况及其可能的出现。

关键在于，对这些在本质上导致操作迫害了老舍的始作俑者，能不能进行至少是灵魂的拷问？

因为，这些将因老舍一事受到牵扯的人们，不是那已无权无势的前红卫兵，而相当多是文革前以至文革后都处于庙堂中之人。现在，要他们也向老舍的冤魂忏悔，这能办得到吗？

如果，一个号称“文革博物馆”、要留给后人的某种警示设置，只不过展示一些轻飘飘的事件与悲剧冤魂，只是审判小鬼，却不究阎王；只敢棒打当年那些年少而不甚懂事的红卫兵，让后人以为真是红卫兵搅翻了那个天、造了那些孽，而隐去这之中主要或重要的当事人，那这“博物馆”，还能体现文革历史的真实吗？！

由此可见，既然连老舍之冤这文化圈中的事，都只能“点到为止”，都不可能完整追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也无法进行真正的反思，那文革中其他远比这重大的事情（例如上述所说的几类问题），又怎么可能清清楚楚、是非分明的摆进“博物馆”、展示于历史的天空之中？

既如此，现在建这“文革博物馆”，又有何意义！

现在，不建也罢。

不主张现在建这“文革博物馆”，这之中，一方面是有人不想建，也不能建；二方面则如本文观点者，希望宁缺勿曲。

同样的意见，却有不同的动机。从这一点上，应也可以体会到那文革的复杂性。

□ 2005年11月9日

~~~~~

### 【人物追踪】

采访蒯大富

• 田炳信 •

采访人物：蒯大富，原清华大学学生，文革期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之一

采访时间：2004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新桃园酒店22号房

采访蒯大富，颇费心思。距今38年前，蒯大富曾是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当年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之一，现在50岁到70岁的人，不知道蒯大富的恐怕不多。

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的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人世间的事就这么简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复杂。故乡行云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经历了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后，一个人，特别是在瞬间经历过高速的“政治过山车”的人，常怀一种看透和看破的心态。大多是消极，而在消极中，能有一种积极，一种沉淀后的发酵，一声沉沦后的口哨，那就别有一番意境。

田炳信：我的《深谈》栏目喜欢找些有阅历、人生有起有落的人聊。因为只有经过比较、反复折腾，人性中的各种味道才会散发出来。

蒯大富：咱们讲好了，我们朋友间聊聊天可以，任何媒体上都不要发表。你知道凤凰卫视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刘长乐、吴小莉、陈鲁豫这些大腕基本都来过。陈鲁豫不是出了本书吗，其中一章就专门讲到为什么拒绝接受她的采访，但我们聊得不错，她人很好。

◇ 老婆孩子落户深圳

田炳信：你是觉得现在不合适谈呢还是怕谈了对现在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据我观察，经历过大事件的人一般都有三种心态：一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是屡战屡胜，牛气冲天，自始至终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还有一种就是屡败屡战，在下风头高昂着头，展现了单体生命的韧劲和坚强。

蒯大富：是不合适谈。我给你看这些老照片（蒯大富随身带了3本旧影集让笔者看）。

田炳信：你当年很瘦。

蒯大富：造反嘛，就得瘦。这照片上有谢富治、周恩来、林彪……是朋友帮我保存的。

田炳信：是你交给他保存的？

蒯大富：不，是人家从档案里翻出来，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老田你今年多少岁数？

田炳信：我今年48。

蒯大富：“文革”时期的事应当还记得。

田炳信：记得。我去年底写了本《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你有空翻翻。

蒯大富：这本书还是有分量的。我老婆、孩子的户口直到这个月才刚调进深圳。为什么好多事情不好谈，就是这个。按照深圳市入户的条件，十个条件里只要有一个符合就可以了，像在深圳连续居住5年以上，我够了；在深圳办公司年交税10万元以上，我一年交三四十万。但因为我是蒯大富，就难办。

田炳信：那你的户口现在办进来没？

蒯大富：我的还没办。

田炳信：你也不想办了吧。

蒯大富：我想办。现在好多做法我不认可，要想突破这层层关联，不容易。

田炳信：我这本书是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第一本。15年前我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专门做过3篇相关的“国内动态清样”，直到现在拿出来，当时所提的观点都还没过时。

蒯大富：现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有户籍制度？

田炳信：据我调查只有中非的贝宁、朝鲜和中国，但那两个国家户籍制度的严格性和长期性都不如中国。你是哪年出生的？

蒯大富：1945年生，1963年入学。

田炳信：后来凤凰卫视的采访做了吗？



蒯大富：没有，它要能播我肯定接受它采访。鲁豫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不肯接受她的采访，一个是我，一个是张玉凤。说白了，我想说的话她不敢播，她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没必要说。

田炳信：那能不能这样，你想说的话我让你登出来，你不想说的话我就不写？

蒯大富：你根本做不到。

◇ 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

田炳信：你们家是什么出身？

蒯大富：我爷爷是新四军，爸爸是共产党员，要不当年怎能红起来呢，敢造反，有底气。我们家是江苏盐城嘛。

田炳信：其实“文革”初期谁不挤破脑袋想当造反派，只不过有的人因家庭出身、个人背景、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没当上而已。当年不是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嘛。

蒯大富：要讲出历史的真相其实很难。

田炳信：如今社会越来越成熟，人们更加客观，更加接近真实。这些年你个人的经历大起大落，大红大黑，你自己反思过“文革”吗？

蒯大富：现在的社会环境是比以往宽松了许多，但我还是不想碰“文革”这一块。

田炳信：只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有得有失。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会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你应该写个回忆录。弹指一挥间，“文革”距今已38年。你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公正不公正，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眸“文革”，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

田炳信：是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

蒯大富：没什么难言之隐，就像你说“文革”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当年你21岁，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回头看“文革”，有没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有没有那种感觉？

蒯大富：我自己并不后悔。我始终只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上。

田炳信：你被抓起来是因为“5·16”吧？

蒯大富：那是两回事，但我也是“5·16”分子，我被关了17年。

田炳信：韩爱晶怎么就判了15年呢？

蒯大富：他罪过小，我罪过大嘛。

田炳信：聂元梓呢？

蒯大富：也是17年，差点没判死刑。

田炳信：是谁刀下留情了？

蒯大富：那肯定还是邓小平了。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前段时间我去北京，见到了当年的审判长。当年他一直护着我，非常好的一个人，要不是他我还得多坐8年。

田炳信：你后来减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坐满了。

田炳信：是在秦城监狱？

蒯大富：那也去过。

田炳信：受刑了吗？

蒯大富：没有，还比较客气。我没获减刑是因为我始终不认账，他们说“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法庭辩论时，检察官、法官都被我驳倒了。我说《刑法》第90条列明：反革命要有动机和行为。你能证明我有这种动机和行为吗？当时是1983年开庭，审判1966年的案子。如果回到1966年，我那时才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说我是非常纯正的革命者，怎么可能反革命？我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当时的庭审现场有4台摄像机拍摄，录像带现都在档案馆里。后来我去要过，但他们不给。

审判长说：“我拒绝回答被告的问题。”我说：“我现在是被告人，您代表国家起诉我，我不得不过来。现在是法庭辩论阶段，我刚才的发言与本案有关，你必须回答。不回答也可以，但你现在就要给我撤消起诉。”

田炳信：当时法庭上有多少人？

蒯大富：800多人。

田炳信：你给判了17年，那以前羁押的时间顶不顶刑期？

蒯大富：顶了，要不还要多坐8年嘛。我是1978年被抓，1983年审判。从1970年

到1987年，关了17年。

◇ 不很同意说“上了毛的当”

田炳信：你在清华是1968年分配的？

蒯大富：对，分到宁夏。1970年时北京选人大代表，毛泽东还提名我当人大代表。

田炳信：1966年时你还是个大学生，但毛在中国大地已被神化了，被推到了顶峰。

蒯大富：毛被神化了这个是肯定的。

田炳信：你获毛接见时的心情和感觉怎样？

蒯大富：真是像见到了神，很激动。他那时的威望现在是不能想象的。

田炳信：跟他握完手回来有同学和你握手吗？

蒯大富：有啊。

田炳信：到今天你怎么评价毛泽东？

蒯大富：我不是很同意“上当受骗”的说法。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的。

田炳信：1987年你获释时被关在哪？

蒯大富：青海省共和县的塘格木监狱，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

田炳信：要参加劳动吗？

蒯大富：不需要。

田炳信：能见到其他人吗？

蒯大富：不行，我们一人一个院。

田炳信：待遇还不错？

蒯大富：待遇还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书看，报纸也有。你只要把心情稳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

田炳信：我曾经说中国有三所大学：一所叫中国社会大学；一所叫解放军大学；一所叫监狱大学。你上了两个。

蒯大富：我在监狱把英语学会了，原来学的是俄语。也不能叫学会了，但拿字典能看。

田炳信：你们这代人有没感觉生错了年代？

蒯大富：我一点没有，说实在还挺骄傲。

田炳信：遗憾呢？

蒯大富：那总会有的嘛。

田炳信：如果没有“文革”，你想你现在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蒯大富：那我至少会是一个不错的工程师，在核电站。

田炳信：搞原子弹。

蒯大富：对，搞原子弹。

田炳信：我是在核工业部202厂长大的，在包头，11岁时曾目睹了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卧轨自杀现场。你现在就一个女儿是吧？

蒯大富：对。我女儿名字很好记，我叫大富，她叫小琼。几年前有朋友在一起吃饭时问她：“琼琼，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名人啊？”你知道我女儿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爸爸当年跟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

田炳信：她多大？

蒯大富：今年15岁。我跟她说：“爸爸当年上清华，6年没花掉1000块钱，你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都不够。”我女儿说：“那谁让你生在那个时代。”

◇ 努力挣钱养家很想旅游

田炳信：改革开放这25年你怎么看？

蒯大富：长足进步，但真要长治久安还要继续前进，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

田炳信：你现在还喜欢读书吗？

蒯大富：很喜欢，1/3的精力都花在读书上。现在信息量太大，不读不行。各种杂志，国外出的书籍，每晚都忽悠忽悠地读完了才睡觉。

田炳信：现在的公司你是老板还是跟人合伙？

蒯大富：跟一个音响专家，他出全资，我就出蒯大富。

田炳信：你的名字还是无形资产呢。那你是拿分红还是拿工资？

蒯大富：有工资也有分红。工资就是每月几千块，分红就很大，我们各占50%。

田炳信：你自认是商人吗？

蒯大富：我不是，只是挣钱养家糊口。

田炳信：如果让你挑一个职业的话……

蒯大富：我想去旅游。我老婆老说我不喜欢大自然，我说我要是喜欢大自然，你们娘俩就得喝西北风了。

#### ◇ 江青对我格外关怀

田炳信：你曾跟江青打过不少交道，外面说她很厉害很霸道，是这样吗？

蒯大富：胡说，她很有修养。1992年时我下海到山东蓬莱，当时山东省外事办的副主任找到我，说有外国记者要来采访，你可别乱说。我说外国人我见多了，不会乱说的。两个日本记者来后，一口气就问了很多问题：“文革”期间，你和江青女士有很多接触，你对她怎么看？现在全国到处都讲放《东方红》，你对毛泽东又怎么看？“文革”初期你们曾反对过邓小平先生，现在他在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百年之后，中国将会怎样？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田炳信：你怎么回答？

蒯大富：我说先回答关于江青女士的问题。江青女士在我眼里对我格外地关怀。有次开会中间，江青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她把我叫过去跟她汇报清华大学的情况。我们分别坐在两个沙发上。汇报过程中，她的护理给她打开头发梳头。

田炳信：她有头发吗？

蒯大富：外间胡说八道，她有非常漂亮的乌黑的长发，护理给她梳头的目的就是按摩吧。她因癌症化疗，耳朵听力受了影响，头发一打开就更听不到了，她就一把拉着我坐到她身旁，贴着她耳朵说话。我认为，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的8亿人口，尤其是女同胞里，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

田炳信：她能写一手好毛笔字。

蒯大富：对啊，她的马列主义水平、组织和宣传能力都很强，还有她的书法，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非如此，我们怎么能解释毛泽东主席会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他选择的余地非常大，这只能说明江青确实有过人之处。但无可否认，她也有缺点，毛泽东曾批评她“缺少自知之明”，她确实想当领袖，但她的德和能还不相称，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后面的悲剧。我讲的这些后来日本人在《每日新闻》上一字不落地全发了出来。

#### ◇ 周恩来清华夜会“右派”

田炳信：1966年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后，北京从各部委抽调了5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清华大学是谁去的？

蒯大富：组长是经委主任叶林，顾问是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主席和少奇

之间有矛盾，他们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我不过是从农村出来的，后来把刘少奇打倒了，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了路线斗争，那是吹牛，不可能。工作组进校后，秩序立刻就恢复了，说实在的也没错。

田炳信：你当时是什么职务？

蒯大富：班上的“文革”小组组长，每个班都有的。之前是清华大学广播编辑组的组长。

田炳信：舆论工具，笔杆子啊。

蒯大富：当时工作组的第一反应就是1957年的“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右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条线上了。我们和工作组斗争，工作组就开始围剿给他们提意见的人，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到最后我们都感到自己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800多个反革命，我是头，第一号，叫“蒯派”。

田炳信：工作组把你树起来了，当时念大几？

蒯大富：大三，当时我已经准备着要被送劳改了，可做梦也想不到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就回北京了，刘少奇还以为毛是来支持他的，可毛回京后却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风向变了，谁也想不到，刘少奇于是赶快把我给放了。

田炳信：当时把你关起来了？

蒯大富：隔离审查，关禁闭，像现在的“双规”。几天后的7月29日，毛泽东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事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告诉我的，他跟刘少奇女儿刘涛两人都是清华“保皇派”红卫兵的头。当时我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啊，兴奋得不行，后来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就表示不是反革命了。

田炳信：会堂里有多少人？

蒯大富：三层楼，1万5千人哪。

田炳信：当时哭了没？

蒯大富：没有。7月30日，贺鹏飞又通知说，今晚吃完饭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最高级的一个小院子，当时唯一有沙发的地方，专门接待外宾。我问干嘛？他没说明。晚上7点我就去了，一直没动静，我坐着也困了，大约10点钟就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呼噜。大约是31日的凌晨2点，贺鹏飞把我推醒了说：“找你说话的人来了。”我揉揉眼睛赶快坐起来，只听门口一辆小汽车经过，跟着轻轻的脚步声就到了门口。一推门，我给吓坏了。

田炳信：谁来了？

蒯大富：周恩来。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时候周总理来了，我还没平反呢，而且是凌晨2点。我说：“总理，您怎么来了？”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我说是，他说你坐。可我哪敢坐嘛。

田炳信：你就站在那？哆嗦？

蒯大富：真哆嗦，草民啊，没见过大人物。周总理说“请坐，请坐”，我还是不敢坐。他的秘书孙岳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我只好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田炳信：哎呀，现在下级见上级都那样，原来都是跟你学的。

蒯大富：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坐下后，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这是总理第一次向我保证啊。

田炳信：你很紧张吧？

蒯大富：简直不知所以。后来我镇静一下说：“总理，我向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然后就开始讲。孙岳会速记，一字不落地全部记下来，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总理也拿起个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我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一会儿贺鹏飞进来了，他不叫“总理”，叫“周伯伯”，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总理说：“我今天就听蒯大富一个人汇报，你出去吧。”把他赶出去了。过了20分钟，贺鹏飞又进来说“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他跟王光美熟，怕我告工作组的状。周总理说：“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听蒯大富一个人说。你不许进来了。”从凌晨2点到5点，我汇报了3个小时，太阳都出来了。周总理就说：“我下面还有个会，今天咱们先说到这，我知道你还没说完，今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说，我派车来接你。”

#### ◇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之谜

田炳信：你当晚又去了？

蒯大富：晚上7点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坐下一刻钟不到，周总理领着两个50多岁的人来了，说：“这位是山东省省委书记，这位是你们省的省委书记，我带他们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敢反对吗？然后我就继续告工作组的状，从7点讲到10点又讲了3个小时。我说：“总理，我讲完了，我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都是真实的想法。”

周总理说：“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谢谢你了。我今晚还有个会，没空陪你吃饭了，我请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同志做了点夜宵，马上送来，再见。”然后和我握了下手就走了。你们注意啊，这天是1966年的7月31日。8月5日，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出来了，给刘少奇以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

田炳信：这大字报真是毛主席写的吗？他是写在一张大字报上还是写在什么稿纸上？

蒯大富：这到现在还是个谜。

田炳信：写在纸上还是真写大字报，这是两个概念。

蒯大富：我没见过，也没人证明看到过。

田炳信：你都没看到，估计能看到的人也不多了。

蒯大富：我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两年时间，叫“狂飙年代”，我们正好处在风口浪尖上。

田炳信：我说得没错，你是个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摆渡的人。我说历史只有一只耳朵，很多东西进去了出不来……

蒯大富：薄一波当时问过我：“蒯大富，你是‘左’还是‘右’？”我说：“我是‘左’。”他说：“你极‘左’了就变‘右’了。”2002年，我独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黄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宝塔山，让我十分震惊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宝塔山，而是刻在宝塔塔檐上的四个字：鸟瞰红尘。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大度，一种局外的感觉。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喜欢，他就像印钞机般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厌恶，他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转瞬即逝。我想，事情过去38年了，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从搜集历史碎片的角度，作一真实的记录，总比写那些歌星的绯闻、政客的无耻、商人的逐利故事更具新闻和史料价值。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五）

• 刘文忠 •

申诉万言书

自从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中华政坛上可以说是“春寒料峭”的局势。这二年多中，神州大地既从十年“文革”的漫漫长夜中苏醒过来，中共十一大在华国锋主席主持下宣布“文革”全面结束，提出“抓纲治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国民经济，但又强调“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推行“两个凡是”路线，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时间“凡是派”占优势，严重阻挠在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共产党现实主义者的领袖邓小平得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们强大支持第三次复出，重返中华政坛，一开始就对“凡是派”猛烈冲击。据三姐来信告诉我，邓早在1977年5月复出的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接着邓在公开的内部的多次场合，一再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亲自授意并大力支持胡耀邦就南大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党全国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辩论，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思想解放大运动。随着三姐的不断来信，给我提供了胡耀邦在中组部多次指示讲话精神。胡耀邦说：“我们与‘两个凡是’斗争就是要破除迷信，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胡又说：“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邓与耀邦的一系列讲话内容，似甘露滋润我这块干枯了十三年的心田，似阳光照暖了我冰冻了十三年的心灵。

三姐又来信询问我与辉哥案情的详细情况。她与其它六个兄姐确实到我兄弟俩当年出事后，才知道案情大概，而对其中具体内容，事实经过毫无所知。我立即给她回信，把我与辉哥当时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详实细节一一告诉她。她很快回信，鼓励我上诉，要我在申诉书上具体写明，之所以遭二次判刑，主要就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她告诉我，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事不宜迟，赶快申诉。

在邓、耀邦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在三姐来信的谆谆指点下，我利用休息天，大胆写了一份

长达万言的申诉信，申诉我第一次66年参与哥——刘文辉攻击“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匿名信一案，申诉我第二次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认定所谓屡教不改继续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一案。我在申诉书上写道：反对文化大革命没有错，判决书对我认定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要求平反，恢复名誉，还我人身自由，还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申诉书”写好后，我又誊清复写了许多份。寄到哪里去呢？按照三姐的指点，我首先寄给了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接着我又寄给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后来我索性直接寄给中央领导邓小平、胡耀邦。同时，我一面打报告给场部，申请回上海探亲，准备亲身去上海法院机关上访面诉。

寄出一系列的申诉信，送给场部探亲申请报告后，我照常勤快地在建筑工地上劳动，平时与场员、队友们有说有笑，若无其事地过日子。但我心里常是忐忑不安，不知道有关单位收到我申诉信否？收到了认真审阅否？场部同意我回沪探亲否？白天忙碌干活时，这些念头都扔开了，但到了夜晚，每当睡在床铺上，夜静更深，思念不止，辗转反侧，一连几夜难以合眼，望着窗外透进来的洁白月光，心里默默祈求幸运之神快点降临到我头上吧！邓公耀邦的温暖阳光快点落实到我身上，照亮我的漫漫长夜吧！我记得，法国大仲马名著《基督山伯爵》中写到，年青有为的水手爱德蒙·邓蒂斯，也是19岁被冤枉陷害投入了伊夫堡，度过了十四年地狱生活，结果苦尽甘来巧妙地脱身出狱，重返人间。我是虚龄20岁实龄19岁开始系身监狱的，现今即将达十四个年头，是否也能苦尽甘来呢？固然大仲马写的是小说，编造的故事，但其中有句话颇有意思：“凡是连年遭祸的人，当长期的灾祸过去以后，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好运。”应该说，“文革”灾祸已过去二年多了，我这个“连年遭祸的人”，何日遇到好运之神呢？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喃喃自信：终有这一天！

白茅岭农场总部管教科负责人突然来分场找我谈话。那天起初我心里特别激动，我想或申诉或申请有点眉目了，急忙放下手里在抛送的砖头，三步并作二步，跨进分场办公室，但瞥见来人那严肃的脸色，我顿时一颗热心又掉进冰窟里，冷了起来，估计不会有好事。

“刘文忠，你好大胆！一个改造了13年的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戴了帽子，仍然坚持顽固反动立场，竟敢第一个暗中到处上诉”，管教头头高声吆喝着，把他手里几封信对我面前扬扬，“老实告诉你，你写的申诉书全都退回我们白茅岭总场，你休想白日做梦，休想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你这样不思悔改，一定没有好下场，等待你的将罪加一等，再给你加刑！听懂了吗？”

面对他口口声声的叫喊威胁，我这时心里反而平静了。因为我瞥见他手里只有我写的二、三封申诉信，而我实际反复给有关单位及中央领导寄了共计十二、三封申诉信。这年头“两个凡是”作怪，有些单位的信访处“阶级斗争”钢弦依然紧绷着，所以毫不负责地将我血泪写成的申诉信草率地转回给农场，但我还有近十封申诉信在有关领导单位。农场这个“专政”场所，群山闭塞，天高皇帝远，中央思想解放的春风还未吹进来，这种管教干部满脑子的“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我同他一般见识也犯不着，所以我昂首站立，挺直腰板，耐心听他训话。

“刘文忠，念你一贯在农场表现较好，总场领导对你不记这次的过错，希望你还是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管教科头头不知受总场领导之意还是他自己从报上看到许多平反消息的影响，口气变缓和些。

“知道了，”我平静地回答了这三个字，接着趁机问他：“我申请回上海探亲的报告你们研究过了吗？”

“这个么，按理说你又犯了错误，不该宽恕你，但总场领导念你这几年劳改不差，多年来从未回过上海，所以法外开恩，批准了。”

“谢谢，谢谢！”我情不自禁地表示，低头浅恭了二下。

从分场办公室出来回到工地，当大家知道了我写申诉书受训这事，一些知心好友纷纷劝我罢手，并为我担心捏把汗。我微笑着坚定地表示，要不屈不挠地继续申诉，我相信中央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朋友们为我有这般大无畏的勇气而折服，并为我能回沪探亲而高兴。

78年12月下旬，我终于获得了回沪探亲15天的机会。我归心似箭，一到上海第二天，就去市高级人民法院接待室，询问我几次写来的申诉书的下落。高法院一位姓单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所写的不少申诉材料，包括寄给北京的材料，都已转到他们复查组手里，高法院已重视在复查我与哥刘文辉一案的工作。他说，刘文辉是上海地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处决的特大政治犯，也是目前我们掌握反文革最厉害的一个人和一件大案，对他案子的纠错和平反结论，不是单上海高院能拍板决定的，但我们会郑重认真复查的。他还说，“本来要去农场找你，你既然到了上海，一个月内就不要急于回去，可能要找你进一步了解案情。”这段“探亲”假期，我几乎天天跑福州路高法院，连门口警卫都认得我。这时上诉跑高法院的人还不多，但我还是碰到了一些熟人，都是在一所与市监狱同关的难友，他们也刑释了，得到某些内部消息，从新疆、青海赶来上海申诉。有些人很有社会背景，本人就是高知、高干或民主人士，与他们交谈中，更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央有关政策，增强了申诉平反的信心。

就在上海探亲期间，我系统地读到1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与报纸社论。华国锋失势了，“凡是派”失民心失天下。而邓公为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中央领导，作出了伟大的决定，全面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新时期开始了。我读着报上刊登的全会公报，内心激动万分，兴奋地对父母与姐姐姐夫们说：“有希望了，大有希望了！”继而一想，我的探亲假期已超过了一星期，急忙又赶到福州路，找到高法院单同志，说：“我一定要回农场了，否则我戴帽子的人逾期回去会被关禁闭批斗的。”单同志和蔼可亲地笑了笑，对我说：“如果农场关你，你告诉他们‘是上海高级法院留我有事’。这是电话，叫他们打电话来联系。”单同志又亲切地告诉我：“你的问题基本上复查完毕，已有结论，你会平反的。但我们高院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你回上海的安置要做不少工作。你先回去耐心等待，不超过二个月，我们会给你落实解决的。可你要保证这消息不准在白茅岭农场乱讲。你属于第一批平反。你如果回去乱讲，引起麻烦，后果你负责。”他又说：“你哥哥的问题很复杂，暂时先解决你的问题。”我听了他的话，心中一块石头总算逐渐落地，激动地向他表示，回去后一定照样劳动，绝不乱讲一句话。从高法院出来，我赶快回到日晖四村的家里，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父母、哥哥姐姐，大家都为我高兴，但我又担心辉哥平反的事夜长梦多而搁浅。

第二天，我赶回了白茅岭农场山下坡分场。卢场长当面训斥我一顿。我把上海高级法院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们，请他们直接同上海联系。卢场长半信半疑地接过电话号码，双眼瞪着我说：“如果有假，你当心吃不了兜着走。”翌日，我边劳动边等待分场对我的打击报复，队友也都替我捏把汗。一天过去，平安无事。大家也觉得奇怪，照例象我这种戴帽场员超假回场免不了关禁闭、遭批斗。我牢记上海法院单同志的嘱咐，不露声色，照样出工劳动，默默耐心等待，每天撕日历盼望二个月后幸运回音。

走出白茅岭

3月中旬的一天午后，我正在工地上劳动，突然场部李干事骑着摩托车来找我，大声招呼我：“小刘，快回场部，你小子出头了，高法院来人要带你回上海了。”我知道幸运希望终于来到了，尽管二个月约期超过了七天，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赶快将手头活儿向老蔡师傅一一交待。老蔡与其它队友纷纷放下工具，围上李干事，打听什么事。李干事说：“小刘平反了，上海高法院派车来接他回上海，正等在场部。”我兴奋地向队长小潘、蔡师傅等打招呼：“我先回去了。”朋友、师傅都围着我说：“不要急于走，等我们收工回来送你。”“小刘你也真行，保密到

今天，也要给我们讲讲这么回事。”我诚挚地点头道：“一定等你们。”我同身边的队长小潘、老蔡师傅与其它几个好朋友一一握手，李干事催我快去场部，过来一把拉我上他摩托车后座，一溜烟的把我接到分场部办公室。

卢场长和耿书记都在，陪着上海高法院的单同志等我。我高兴万分地叫声“单同志好！”并从他手里接过平反通知书，激动异常地签了字。卢场长他们还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他们似乎在想，昨天还是一个戴帽反革命分子，还警告他不要白日做梦，梦想翻文化大革命案，今天说翻就翻了，突然变为人民，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说变就变了。他们见我签字后，高法院单同志主动跟我热烈握手，亲切拍肩，想也要对我有所表示，皮笑肉不笑的勉强上来与我握手，说：“祝贺你获得平反，要感谢党感谢华主席。”我马上回答道：“我要感谢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他们听了不知所云，脸色十分尴尬。总场管教科人叫我回宿舍把东西整理一下，今晚要接我住总场招待所，明天一早可与法院同志一起回上海。我稍稍犹豫了一下，提出“我这里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今天我仍住这里，明天你们来接我吧。”他们与单同志商量了一下就同意我在分场过夜。单同志说，他们还要急于去服刑大队办理释放几个上海红革会头头事，所以同总场管教科人员匆匆离去了。

尽管我预料今天这样的日子肯定会到来，平反书的内容我不看也清楚，但当我拿到单同志递给的这张十六开薄纸时，内心兴奋，手头颤抖，签的“刘文忠”三字难免歪斜。毕竟前后十四个年头，实足足十三零四个月的牢狱灾难啊！我的天冤地枉的罪案总算被推翻了，我刘文忠平反自由了！尽管对我哥文辉的案子还维持原判，我内心不服，但我想，回到上海后继续上诉，历史是最公平的审判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思想解放的力度提高，对毛泽东错误的加深认识，辉哥的冤案一定会平反昭雪的。霸权无情天有情，当我目送单同志他们离去，转头向卢场长、耿书记招呼一声“我走了”，昂首挺胸跨出分场部办公大楼，只见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原先遮遮掩掩的大块乌云瞬间消失了。我仰天欢叹一声“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是公正的，云开日出艳阳天，暗无天日的十年“文革”彻底被否定了。我边朝宿舍方向走，边捏指计算，十三年零四个月，四千八百六十七天，将近五千个日日夜夜，今天总算熬出了头，苦尽甘来，我不知道多少人熬得发了疯，多少人被恶魔逼死在各种各样的专政监督场合，更不知还有多少人仍在苦苦等待，渴望着救星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共产党伟人去解救他们，跳出火坑，走出地狱？我不由想起在一所最苦难日子里，郁校长、胡兄、飞行员他们与我互相勉励的一句口头禅：“活着就是胜利！”这是何等珍贵的金玉良言啊！是我们这些政治犯九死一生的强大精神支柱。我今天取得了人生的历史性胜利，可惜我的辉哥、音乐家陆洪恩、思想密友胡兄……，他们如能活到今天多好啊！我深深感到，自己是“文革”灾难的幸存者之一，我们的幸存是由于不少人在我们前头充当了不幸，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实际上是踩着无数人生命的血迹活下来的，我们幸存者的心胸里盘旋着无数不幸者的呐喊、血管里流淌着他们许多先驱者的血与泪，我们活下来了，就要把他们的遗志永存心头一起活下去，就要更加坚强更为奋发更自觉地去为中华民族实现完全彻底的“民主、自由、平等、富强”而奉献终生。

回到宿舍，我刚刚开始整理行李物品，就有一些在家的场员听到我平反消息陆续来祝贺我。他们为我高兴，也给自己看到了希望。有道是“物以稀为贵”，我是十几年来山下坡分场第一个正式平反、堂堂正正回上海的人，也是“文革”结束后白茅岭农场反革命犯中第一批平反回上海的人……。正在我边思绪翻腾边整理最后一点对象时，小小的宿舍陋门被一群队员推搡得洞开无遗，原来四点不到，建筑队同事们都提早收工回来了，大家一齐闯进来围着我，兴奋地你一句我一句追问打听我平反经过，问我“是否有靠山？”“申诉书是怎么样写的？”我坦然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背景和靠山。我刚刑满释放到这里当场员就从姐姐来信上知道即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全面否定“文革”，要清算毛泽东错误。我66年文革初起时参与了三哥反对文化大革命一案，我三哥可以说是“反文革第一人”，仅仅四个月就被四人帮及上海余党枪杀在文化广场的万人大会上，这在当时是上海的一件大案。我去年秋冬时开始申诉，不断写申诉信寄给

上海法院与北京中央领导。当时总场来人威胁我要加刑，我不怕，今天总算胜利了。

大家说着，笑着，热闹一团时，小潘、季工、老蔡、老耿等几位知己好友拿来酒与菜，热情为我送行。我很感动，很少喝酒的我不禁开怀畅饮，几杯下肚，情绪尤为激昂，我口无顾忌地说道：“我是直接攻击文革，攻击毛泽东的人。分场有不少反革命场员罪行比我轻得多，特别是一些58年留场的场员，你们有什么罪？全是些鸡毛蒜皮事，人民内部矛盾小事，却被极左路线送到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时光在孤苦寂寞中流逝。你们是毛泽东极左路线下的牺牲品。当年手拿几个月的劳教通知书入白茅岭，却一直不明不白未见宣判。大家展望未来，渺茫叵测，望不见何年何月何日能获得自由身。大家在这块荒山野地里长年劳改，苦难扎根，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叫任何人也想不通，这算什么法律？是哪种国家的王法？完全比封建专制皇朝的做法还要残忍无比！我为大家悲哀，我替大家鸣不平！我与你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我们所有场员来说，回上海是多么诱人的希望事，那里是我们从小生活长大的故乡，有我们亲人等着团聚。大家年年想，月月盼，天天思念，我算是盼到了，而你们呢？现今伟大的共产党人邓小平、胡耀邦掌握了中国天下，你们也有希望了，我只是先申诉先走一步，你们后申诉也会平反回上海的。邓公、耀邦领导的中央，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中央政策好了，文化大革命灾难结束了，‘两个凡是’也被推翻了，你们还怕什么？胆怯什么？大胆申诉，我这么大的案子都能申诉成功，你们为什么不能？……”我爽朗地答应他们，一回到上海，就一定会把外面的情况、中央的新政策，上海平反消息，写信来告诉他们，请大家相信我。

我回到上海，激动异常地踏进日晖四村的家里，年迈的父母亲高兴得热泪盈眶，哥哥、姐姐们也齐声祝贺，一批外甥外甥因更是围住我这个舅舅叽叽喳喳地问长问短。我从第二天起，就给白茅岭农场的朋友写信，寄去收集到的有关邓小平、胡耀邦一系列讲话精神及平反政策资料。不久收到那里朋友的回信，说：“你们第一批平反回上海，这事犹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里，激起了千层巨浪，阵阵涟漪，场员农场不少人也得平反回上海，各大队服刑的政治犯也纷纷写申诉书，一批接一批的冤假错案被有关部门落实平反，许许多多获得了自由回了上海。”

回厂再上诉

1979年3月16日下午，我由上海高级法院派车子接送回老单位。车到厂门口，熟悉的老地方，看见牌子已改称“上海远光电器厂”。

高法院同志当着我的面，向厂领导传达了中央平反政策精神，要厂里尽快落实我的安置问题：第一，工资补发，按13年补发；第二，户口落实，因我原住房子文革中被江南造船厂造反派组织非法没收，法院已责令他们三个月内退还。“现在刘文忠无居住处，他大姐家人口多又无法接受，所以暂要工厂给他安置好。另外刘文忠刚回厂，发生什么困难，你们都要在可能情况尽量照顾他。”厂领导一一点头照办。

我回工厂到冲床车间上班劳动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扑在为辉哥冤案平反而奔忙，在三姐有力支持下继续上诉。上海高法院驳回了，我们不服，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再上诉。我们家属中，其它哥哥姐姐都被文革吓怕了，一直心有余悸，胆战心惊过日子。只有三姐和四哥是最有胆量坚决支持我再上诉，坚定不移地要为辉哥遇害讨回历史公道。辉哥死时仅仅虚龄31岁。他短暂的人生既复杂又辉煌。21岁时戴右派帽子，29岁时又因交代出逃国外企图而被打成反革命，一年不到，他冒死攻击文革而遭毒手，最终血溅刑场。我与三姐一起到上海高法院上访，找复查组申诉。三姐分析得很清楚：正由于错划了刘文辉的右派帽子，才会逼使他想出潜逃国外的念头。何况这是他相信党的“坦白从宽”政策，彻底交代的，法院判决书上亦写着“因念其最后尚能坦白交代，并愿悔改”等，而且他仅有设想，绝无行动，怎可凭此定他反革命罪呢？显然是冤枉。至于他对“文革十六条”的批驳，十年实践已证实他的先知先觉，很了不起！

面对我三姐这样据理申诉，上海高法院复查组人不得不同意“这种推理说法有道理”，也承认刘文辉66年文革初起就能反文革、驳十六条，是正确的；但刘文辉的匿名信中有大量涉及攻击毛主席的内容，根据目前中央有关政策精神，还是无法平反的。至于将来如何，很难说定，你们家属只有耐心等待，由时间来决定……。我与三姐多次跑福州路，反复替辉哥申辩，但得到的回答总是这几句话。辉哥的含冤难白，真使我心头煎熬日夜不安。

三姐文珠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学一毕业就主动支持内地三线建设去了，三姐夫去西藏，三姐在陕西荒山野里的兵工厂工作。她是有名的女中“一支笔”，颇有才能，“文革”中由于家父问题牵连、加上我与辉哥反革命案的波及，被贴了大字报，始终作为有家庭问题的“臭老九”被压制在最低层。粉碎“四人帮”后三姐与三姐夫一起调回苏州安家。经历了“文革”艰难的折磨，本来冰雪聪明的三姐更加坚强，智慧之光四射。三姐夫从业司法工作，对政策法规了如指掌，又因他出身高干家庭，中央上层内部信息知道得多，所以他俩一直强有力地支持我要为辉哥蒙冤一事坚持上诉，不达平反昭雪目的，决不罢手。三姐指导我不断收集、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讲话、指示，并给我审慎地透彻分析。三姐说，刘文辉的事迹，不仅仅是我们家族的问题，他还是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榜样与骄傲。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彻底全面揭露批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人。他的无比勇气、大无畏精神，是文革初起时独一无二的，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当文革黑暗浊浪刚刚掀起、迷漫开来时，辉哥就用他犀利的眼光，洞察其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本质，有见血封喉之功，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不良用心、作恶目的批驳得体无完肤，在当时确实没有第二人，只有我们辉哥刘文辉。他称毛泽东是个疯子、赌徒，是在拿国家与人民利益疯狂一赌，竟不惜把亿万人民头颅作赌码，把中国大地作赌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年文革的实践证明，究竟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正确，还是辉哥的批驳观点正确？十年血泪成河的事实证明，辉哥是正确的，毛泽东却是彻底的错误者，毛泽东的实践破产了，阶级斗争理论覆灭了，十年文革把中国经济发展倒退了半个世纪。毛泽东、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打倒一切，全面专政”路线，造成全国好人冤狱遍地，坏人弹冠相庆，骇人听闻，史无前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死了二千万人，冤假错案达上千万件，加上各种形形色色株连的人，共整了一亿人，占全国总人数九亿的九分之一。三姐深沉地说：“刘文辉的冤案绝不是个人和家属的冤案，他是代表整个反文革大军中千千万万冤假错案的突出典型。我们兄妹要不惜一切为他上诉昭雪。毛泽东死了，‘四人帮’粉碎了，中国的苦难是到了尽头，但阶级斗争的阴魂仍左右着后毛泽东时代，他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一大批在‘文革’中既得利益者也拼命阻挠全面拨乱反正的进行。现今尽管邓小平、胡耀邦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得了左右全党全国的掌舵大好形势，但‘积重难返’，多如牛毛的冤假错案不断解决，但还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局的发展，最终你的遗留问题与辉哥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我们做家属的也只有体谅中央的逐步解决策略，耐心再等待一段日子。”

这一番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纵览全局、深明大义的分析，给我也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我对三姐表示，我会坚持不懈地为辉哥平反昭雪呼喊，申诉到底。这段日子里，上海高级法院复查组又找我谈了几次，核实了几件事。记得最后一次复查组负责人沈同志跟我讲过一段话，他说：“你不要再到处写信了，为你哥刘文辉一案不仅上海，北京最高法院都很重视，多次研究讨论并有批文。你是看过刘文辉攻击中央十六条全文内容的人，知道里面涉及攻击毛主席内容的分量严重程度。但无疑刘文辉是攻击文革最彻底最激烈的第一人。这一点，上面是很重视的。结论快了，你耐心等待。”我确实坚决相信，邓公、耀邦的新时代阳光一定会最终告慰辉哥的英魂。

两张《平反书》

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一天终于等来了。这是永生难忘的1982年1月6日。高法院事先

通知我们家属前去听结论。三姐从苏州赶来，二姐从闵行过来，大姐、大姐夫及已从外地回沪宝钢工作的四哥，一起坐在家里面商量，有的提出辉哥一经平反必须要求政府重重赔偿。到日三姐、四哥陪我一起踏进高法院接待室。复查组沈同志向我们宣读了两份《平反书》，一是对辉哥冤案平反昭雪，一是给我彻底平反。并说明，我的问题早已解决，只因刘文辉问题需得北京最高法院核定。两案牵连在一起，所以平反书迟至今日，一起发布。我们家属个个热泪盈眶，感谢政府实事求是。三姐代表家属说到，出于长期受冤案牵连的义愤，我们家属理应要求政府作出赔偿。沈同志对此面露难色，表示要汇报领导，研究研究。三姐申述了家属意见后，又当场深明大义说，当今国家困难重重，过去的巨大灾祸与精神损失都是万恶的文革造成的，恶梦醒来是早晨，辉哥之所以以身殉难，也是出于高尚的救国救民的自觉大无畏牺牲，所以我们只要求讨得历史的公道，政治上的平反昭雪，至于经济赔偿，我们家属不会提什么要求……。沈同志听了三姐这番话，频频点头，深表赞赏。结果按当时有关规定，给逝去的辉哥英灵补偿了二千元微薄的安葬费，后来我们家属全把它用在了辉哥的坟墓上。

现将两张《平反书》实录之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1）沪高刑复字第1531号

刘文辉，男，一九三七年生，江苏无锡市人，原住本市日晖四村十二号四室。

刘文辉经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以（67）沪中刑（一）字第3号判决成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本院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以（67）沪高刑（一）上字第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执行枪决在案。其家属不服判决，提出申诉。经本院复查，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七日以（79）沪高刑审字第797号裁定，驳回申诉。其亲属仍不服，继续申诉。

现经本院复查查明：刘文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书写了所谓“十六条”的传单，指使其弟刘文忠分别寄往全国十四所大院校，传单的主要内容系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不满，其余属思想认识与教育问题，均不构成犯罪。至于原审认定其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污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进行反革命暴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节，均属不实之词，应予否定。因此原判刘文辉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属于错判错杀，应予以平反纠正。据此，本院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79）沪高刑审字第797号裁定（67）沪高刑（一）上字第1号判决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67）沪中刑（一）字第3号判决。

二、宣告刘文辉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1）沪高刑审字第2027号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刘文忠，男，三十五岁，江苏无锡人，现在上海桅灯厂工作，住本市日晖四村十二号四室。

申诉人刘文忠因反革命案，经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72）沪公军审（刑）字第289号判决判处管制三年和有期徒刑七年。刘不服判决，提出申诉经本院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79）沪高刑审字第484号判决维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68）沪军审刑字第132号判处管制三年的判决；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2）沪公审（刑）字第289

号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判决；鉴于刘文忠有悔改表现，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恢复公民权利。现刘仍不服改判判决，再次提出申诉。

现经本院复查查明：刘文忠受其兄刘文辉指使，于一九六六年九月间复写并投寄了所谓“十六条”的传单给全国十四所大中院校属实，但传单的主要内容系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不满，其余属思想认识与教育问题。本院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复查改判时，虽然撤销了对刘文忠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判决，但仍维持原判管制三年并根据其悔改表现，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等均不当，因为按刘文忠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68）沪军审刑字第132号判决以反革命定罪是不对的，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79）沪高刑审字第484号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68）沪军审刑字第132号判决；

二、对刘文忠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一年七月八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完全平反了！彻底平反了！尽管一张“平反”书与生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尽管这是迟到的温暖，是冲破了重重严寒的春风，但毕竟阳光照亮了我们刘家，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吹进了我们刘门老老少少的心田。在这期间，年逾九旬、双目失明的老父亲刘汉宗的历史冤案，所谓“历史反革命”也获得平反。父亲等了25年才拿到这张“平反”书，有关人员轻描淡说的一句“错判了”。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道歉，戴了25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父亲没有欣喜若狂，他已经麻木了。受了无数次的批斗，受了无穷的委屈，不可能说这伤痕这么轻易地被抚平。但重压在子女们头上的这项“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这一苦难贱民的待遇终于到了尽头。父亲等得太久了，已至于双目失明，加上耳聋已经看不到，听不清儿孙们的欢雀情景了。年老双亲对三儿子文辉的平反昭雪，对九儿子文忠的彻底平反，特别高兴，激动得老泪盈眶。兄弟姐妹们也特别高兴，家门中第三代、第四代青少年包括怀抱婴幼儿无不喜逐颜开，朝气蓬勃的嫩脸上绽开了朵朵鲜花。刘家最孝顺、最有才华、最让人伤心欲绝的辉哥蒙冤献身十五年后，今天终于还清白于天下，沉冤昭雪于人间，告慰英灵于九泉！可惜，我们亲属得不到辉哥被杀的全面真相，我回想自己从参予书写投寄，彻底批驳“文革十六条”一案全过程，清楚知道三哥始终报着“挽狂澜于既倒，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后到入狱提审，几位审讯员多次毒骂：“刘文辉是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以及见到三哥临刑时偷偷用血迹书写传出的遗书；加上短短入狱四个多月，“文革暴政”当局迫不及待置他死地的一系列事实真相。可以断定，我三哥刘文辉整个死刑的迫害过程是残忍的、壮烈的，是当局不敢公布的。从时间上和 content 上推断他无愧是血祭“文革”第一人，三哥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立志于“将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像谭嗣同一样，我自横刀向天笑，甘做壮烈的义士！

多年来我们作为他的亲人迫切希望有良知的当年审讯和看守刘文辉的人员能向我们及世人揭示残害真相。我们坚信随着时间推延，历史将会揭示一切。

拒绝当代健忘症（后语）

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刚上中学时，读到邓拓先生一篇著名杂文《专治“健忘症”》。文中说，得了这种“健忘症”的人，“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他引用古代《艾子后语》记载的一则故事，说齐国有个“健忘症”患者，“行则忘止，卧则忘起”，老婆叫他去向艾子求治，不料他骑马挟箭行不多里，下马解大便后，什么都忘了，忘了自己的箭、自己的马，以及自己刚解的粪便，更忘了求医一事，糊里糊涂地鞭马反归，但到了家门口，却不知这是谁的家，连自己的老婆也不认识了……。邓拓先生担心地说，这位健忘

病者“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再发展下去，“大概总不外乎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毋庸讳言，杂文借古讽今，启导人们不要健忘以往的经验教训。该文发表于1962年7月，正是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国内党内怨“左”声起，企求复苏国民经济的历史时刻，无非隐喻多年极左路线的错误健忘不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谁知以后的岁月里社会健忘症越发严重，“阶级斗争”尘嚣尘上，全给邓拓先生不幸而言中，严重到“发疯”与“变傻”的两个恶果：发疯的文化大革命与变傻的亿万顺民。一代思想家、华夏才子邓拓先生本人，也在文革初起的疯狂逼害中沉冤牺牲了！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此话说得何等好啊！

毛泽东亲手制造的十年“文革”浩劫，残酷迫害了一亿人，冤枉死亡了两千万人，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但“文革”最大的恶果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从心灵上彻底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道德、信念做了长达十年时间的无情摧残，百般愚弄。事实上已造成了中国人民的信仰危机，这将深深影响几代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枪杀的是谁？是上海的三十岁的热血青年刘文辉！他是我的三哥。辉哥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一介平民百姓（普通工人），曾热诚响应共产党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21岁就被无端打成“右派分子”。辉哥审慎研究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政治活动，对毛泽东推行的极左路线深恶痛绝。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刘文辉就一针见血地揭露毛泽东祸国殃民，奋起批判《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刘文辉被投入监牢，1967年3月血祭“文革”！临刑前，刘文辉血写了一篇激烈批判毛泽东、彻底反对“文革”的战斗檄文。刘文辉无愧为中国大陆以生命反文革的第一人。我，作为辉哥的唯一“同案人”，回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心头无时不在殷殷流血！死者已矣，对生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反省，揭示历史真相是为了让人们永远铭记历史的教训，更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一个民族只有真正懂得了对生命，对自由权利的尊重，才有可能最终摆脱这样的噩梦。

中华文坛当代泰斗、巴金老前辈，代表所有被“文革”迫害过的知识界，曾多次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留给历史作见证，不让历史再重演，使中华民族世代子孙知道、牢记那十年昏天黑地的惨痛教训。确实，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惟有不忘过去的人才能做未来的主人。文坛前辈萧乾先生说得好，“我们只抓住文革闹剧的几个演员，而没有揪出导演，不揭露他的目的和后果，就无法保证没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可能。”因此他再次建议建立“文革纪念馆”。现在有人提出淡化“文革”向前看，我认为“先生此言差矣！”非常不妥。只有建立了“文革博物馆”或“文革纪念馆”，才是警钟长鸣，让子孙万代牢记血泪教训，华夏神州才会永远朝气蓬勃、太平盛世奋进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可惜的是，“文革”至尽尚未在中国社会大学中成为“显学”，年轻一代又一代的人将越益不知“文革”为何物？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过去了，北京“故宫博物馆”犹在，封建帝王的陵墓一处处曝光于天下，在让人们参观思考之中，深知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反动、残暴，万众一心唾而弃之。当年辛亥革命后张勋复辟失败了，袁世凯称帝毁灭了，谁想再出来当皇帝、行专制霸道，瞬息会湮灭在华夏亿万民众的唾沫中。而十年酷暴的“文革”呢？理所当然应像建立“故宫博物馆”那样建立“文革”博物馆、纪念馆，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这真是中华神州的千年大计、万代必需。否则掉以轻心，翻过一页历史就算数，不啻患上了“当代健忘症”，那将是民族的悲哀！凡有良心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谁都会对这种“健忘症”说“不”，断然拒绝。

先贤唱道“岁月如歌”，前人又说“人生如梦”。歌亦好，梦亦罢，每个人无不在人生旅途中迎着风雨，求生存、争发展。我1947年来到人世，婴幼儿时患小儿麻痹症造成左腿残疾。父亲曾供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解放后打成“历史反革命”，惨遭迫害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作为“反革命子弟”，我20岁那年因协助辉哥投寄彻底批驳“文革十六条”信件，而被投入监牢。在长达十三、四年的“牢狱之灾”中，我亲身遭受了“文革”暴政的酷虐，亲眼目睹了一批又一批知识精英、文化人士、无辜百姓被“文革”残暴虐杀，因毛泽东“神权”肆虐而血泪横飞。那动乱浩劫岁月中亲身经历的中国大陆监狱内的重重黑幕、社会上的纷飞血泪，尽管骇人听闻，我有责任一一追忆，实话实说，不忘过去中华民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可知今天改革开放新时代来之不易。

我拖着残疾左腿，伴随辉哥英灵一起获得平反后，乘着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东风，下海经商，顽强拼搏，“夹缝”奋进，历经重重艰难，开始脱贫致富，率先走向小康之路。然而亲眼目睹“六四事件”，亲身遭遇商海浊浪，以及腐败官方对民营商人的肆意虐待，深感在华夏神州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完善“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机制，还任重道远。为此，我要如实记录从商二十年来遭遇的感人事、蹊跷事、怪现象、愤慨处……。

风雨人生路，悲欢数十年。我从一个残疾苦囚新生，到商海弄潮崛起，拒绝“当代健忘症”，杜绝历史悲剧重演，所以回忆思考讲真话，公诸世人请评说。对于千千万万的家庭来说，也许经历着各种不同形式的风风雨雨，然而却都免不了时代烙印赋予的相同悲欢命运，只是程度有轻重、时间有长短罢了。但愿神州大地从此风调雨顺，人生之路从此和风细雨，华夏子孙不再横遭狂风暴雨，社会生活不再出现腥风血雨，中华民族早日全面进入“民主、自由、平等”繁荣富强的新时代。中国幸甚！天下幸甚！

刘文忠

二零零四年五月于上海

（《风雨人生路》转载完）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